

非物质劳动的纲领化

斯特凡诺·哈尼 著

薛晨 译

布莱恩·霍尔姆斯（Brian Holmes）曾接受《群众》杂志 “工作中的创造力” 专栏的采访。在这个采访中，他指出：

非物质劳动的基本概念是对信息的操控，也是情感的相互作用，它已经成为当代工作进程中甚至在工厂中的中心。该劳动的产品主要以语言、图像和环境为基本形式。工人们不再被当作被剥夺纯粹体力的泰勒主义式（Taylorist）的大猩猩，“工人的灵魂” 回到车间，从那里他们逃进在城市中形成的灵活的工作场，从而得到更多的自治权。（Von Osten, 2004）

语言、图像和环境产品过去属于文化劳动符号。现在，他们逐渐归于非物质劳动的旗帜之下，并且它们很明显是属于本文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文化劳动。

不同于文化劳动那样繁多的分类，非物质劳动宣称自己为一切财富之源。发源于意大利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认为资本强调活劳动（living labour）为财富之源；它首先在美国、南美和南非形成一种重要且独特的运动。活劳动的特征在于它把身体和机器结合在商品的强化生产过程之中。而这些商品一方面来源于信息、交流和控制论，另一方面来源于情感、品味、公共意见、消费和艺术。因此，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劳动有更少的物质性，而是因为它更具有社会性。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他认为这种社会劳动将会产生 “一个高效协同的具有激进自治权的地区”（Lazzarato）。

其中一种协同是与“运动之运动”(movement of movements)有关。汤姆·默特斯(Tom Mertes)编了一套以此为标题的丛书,其中把自治主义者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称作“北方运动中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家”。(Negri 2004, 10)。非物质工人自治呼吁出台一项全面协作的工人法令,伴随运动中的运动主张资本中心的思维不应局限自身的发展潜力。非物质劳动对环境、本土文化、艺术与表演、情感与感情的重视所做出的努力不同程度地被视为这些领域对资本主义稳定物价的阻力,及其社会化阻力的潜在动力。当然,哈特和奈格里关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代表作也已经遭到全面地但却不太有成效地批判,该著作同时也被《群众》的网络版收录(Penguin 2004)。但是非物质劳动中蕴藏的一个新兴潜在在持续地吸引着来自新兴期刊,网络政治团体和社会公平运动的关注。

正如马克思回应新哥达纲领时所说,毫无疑问,人们总会有一种倾向,并将其描绘出一种政治行动,并将其称作新哥达纲领,还会指责它信仰“劳动的超自然创造力。”他的《哥达纲领批判》(Marx 1996)是对由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及其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跟随者提出的政治纲领的一系列旁注。之后为了他们所提到的国家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列宁(Lenin 1943)继承了马克思的批注工作。但是马克思本人依旧继续传阅这些批注。这些批注原本是为了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工人运动两个派系的一个计划统一会议之间脱离关系,拉萨尔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哥达纲领。马克思的这句开篇反击“劳动不是一切财富之源”曾被誉为左翼的权威纲领。之后马克思继续在这第一条旁注中提醒拉萨尔以及他的派系,他写道:

因为资产阶级清晰地认定劳动依靠自然,认为那些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不拥有任何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必将成为其他那些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人的奴隶,

因此，资产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将劳动幻想成超自然创造力。前者只能在后者的许可下工作，因此，前者只能接受后者的许可。（Marx 1966.3）

现在宣称非物质劳动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否是冒着忽视这种劳动的物质条件的风险呢？至少存在两个充分的理由让人们不要太快就提出这个控诉。第一，也是最显著的原因，即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试图将交流物质化，并在似乎可以打破劳动和劳动工具，甚至是活的和死的（dead）劳动之间的严格差别的方式以影响交流。而第二个更具思辨性的原因，则是追问在这样的概念下生成的乐观主义可以做些什么。

对于那些在文化劳动的国际分区下进行的批判和行动主义的实践活动，将非物质劳动载入文化劳动的历史之中，同样也使得它受到了质疑。文化劳动往往惯于遗忘自己劳动的身份，也不记得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Maxwell 2001）。这里也令人想起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近期对控制论者令人信服的批判。它随后也许会引出提议，对文化政策进行干预，作为展现非物质劳动生产条件的生成。也许政策会提供一个机遇去影响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条件。（Miller and Yudice 2002）

在文化劳动认为自己是劳动的前提下，也许可以存在着一种不同的，但和这些干预措施同样有效的方法。本文将假设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对运动之运动中的同盟们而感到兴奋是有值得被尊重的，同时有理由怀疑基于强烈的唯物主义思想下的劳动与文化之间愈加激烈的冲突，是否真的约束了很多值得被鼓励的东西。

然后如何才能让人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呢？或许更直接的说法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兴奋感？我认为，一种我姑且称其为社会主义的纲领（a socialist programmatic）可以使它的潜力得以挖掘并且不断发展，也许这与批判文化政策和文化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家的运动的乌托邦和理论家截然不同。在此我使用纲领（programmatic）一词是为了关注也许会形成社会主义纲领

（a socialist programme）的资本主义问题（problematic of capitalism）。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价值尺度（general equivalent）和商品形态的流行在持续地破坏社会化进程。因此，通过资本主义对价值尺度和商品形态的批判，社会主义纲领将自身塑造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迷恋对象（societal fetish）以此作为社会化的一次实验。

从非物质劳动强化及加速了这种社会化过程以及对这种社会化进程的破坏程度来看，人们应该赞成计划（programming）；应该赞成对商品形态的批判，将其认定是价值尺度对社会符号学进行的分类；应该赞成一种寻求某种形式的批判，这种形式不仅仅可以为了比较而进行分类，还可以不同程度地调动社会符号学知识。非物质劳动不仅容易受到社会主义纲领的影响，更有助于社会主义纲领。麦克·E·布朗（Brown 2005）认为“社会劳动具有批判性，不是因为它或它的代表们清晰地表述了一个关于更加美好的社会或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计划，而仅仅是因为它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私下积累财富无法在不侵害资本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为社会劳动提供支持。”¹那些私下积累财富的条件接近于非物质劳动中工人的精神，和没有获得明确支持的社会性。尽管劳动没有情感和交流，但它必须出售类似于情感或交流这类的东西。非物质劳动也许可以帮助一个纲领认识到社会财富恰恰在于对情感与交流的共同依赖，以及更多的社会财富在于对情感和交流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拓展。一个维持这种依存关系的社会性的纲领更容易受到批评。至少，这将对这种解释的一个推测。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上做旁注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乎纲领，事实恰恰相

¹ 本文受到了麦克·E·布朗（Michael E. Brown，2005）一篇尚未发表的，名为《一个小小的建议》的声明的启发。在这个声明中，作者在当代美国政治处于“永久性危机的状态”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概念。这个纲领有三大要素：对资本的重新批判，对美国左派机构的支持，以及清算左派的过去以摆脱作为反共主义者的遗留问题。（原作者注）

反。马克思在 1875 年写给威廉·布拉克（Wilhelm Bracke）的信值得我们细读，正是这些信件使得德国工人党看到了马克思的批注。马克思在信中写道：“比起一打的计划，真实运动的每一步都更加重要”（Marx 1966: 34）。但是他继续对布拉克说，如果运动可以继续遵循社会民主工人党所创造的艾森纳赫纲领（Eisenach Programme），并隶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创建的第一国际（the First International），那么运动应该会更好。他相信由拉萨尔和他的追随者提出的哥达“统一纲领”（Unity Programme）所提供的内容将会“使党派腐化”。他继续向布拉克抱怨道，（而不是推迟它到一场集体运动已经准备好的重要时期），一个人可以根据对党派运动程度的判断，在全世界之前树起一个里程碑。”（Marx 1966: 35）他告诉布拉克他和恩格斯将会在统一国会成立后公开他们自己的“完全遥不可及”（altogether remote）的看法。并非马克思排斥任何纲领（programmes），他在这里正是为了他自己的纲领而进行辩护，并且他坚称纲领需要共同行动作为中介。但是这仅仅是中介的第一步。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对哥达纲领批判所做的工作是为了从理论上证明该纲领是代表的中介，是一个新的社会迷恋对象（societal fetish）发挥作用的场所。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对马克思《雾月政变》（Eighteenth Brumaire）（Spivak 1988）中代表的双重性的解读非常知名。代表是一个政治术语，是一个人提议为了其他人而行动的情况。但是代表也是一个社会术语，一个人解释其他人的情况。斯皮瓦克注意到代表的二重性不能保存。解释他人成为为他们行动，而为他们行动则仅仅是一次行动，一次解释的行动。或者说，正如斯皮瓦克把代表解释为，在“代理人和人像之间”（between a proxy and a portrait）的关系对比。社会主义纲领意识到这种代表的二重性的不稳定性与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和商品恋物癖通过分隔（separation）和瓦解（collapse）的瞬间来确认自身的稳定性是截然相反的。然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批判性批注作为一个新兴纲领在没有屈从于隔离和瓦解的情况下，不断呈现出这种代表的不稳定性。

共同行动 (Common Action)

非物质劳动将代表的两重社会性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从最初看来，非物质劳动明确地主张分隔和瓦解：它将自身对精神、情感和创造力的吸引力分隔开来，同时它在为这些能力的商品化而哀悼中瓦解。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从程序上来说存在如下风险：非物质劳动忘记了为了自己，它允许他人和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忘记了它自己的再生产条件，以及忘记了从以下情况中可以获得什么：一个人如何通过这些条件被代表和一个人如何代表其他人及被其他人代表。毫无疑问宣扬劳动的新权力会冒着不断重复“资产阶级说所的造成这些条件被忽略这一点就可以赋予它们意义”（Marx 1966: 3）的风险。

我们可以用关于非物质劳动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商学院学生来说明问题。当然，与软件工程师或者广告设计师这种常常被用来举例的职业来说，用商学院学生来举例，或许并没有那么具有代表性。但是，由于商学院学生生产交流和情感商品，由于他们关注于这些商品的自身社会生产组织，因此，他们是最典型的（*par excellence*）非物质劳动者。当代商学院的标准课程反映出了这个情况。这个课程，远不是作为一个资本防御，而是对劳动及其超自然创造力的颂扬。尽管每一个商学院项目会被一个至少坚持计算死的劳动的模块短暂地中断，但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们会被反复告诫去寻找他们作为领导、团队建设者、变革推动者和富有创造力的竞争者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因此这也许可以视为一个警告，作为对非物质劳动听到当代商学院过道中的回声而产生的任何新颂扬的警告。（同时这将搁置对管理作为第一个非物质劳动的完整解释。）然而商学院的大众化意味着那些汇聚在走廊的人们应该为了获得“活着的许可”（*permission to live*）而来（Marx 1966: 3）。课程恰恰是讨论这样的劳动：劳动阶级没有机会接触到可以将其付诸于实践的物质条件。

换句话说，这种回声也许相反，正是要提醒我们商学院学生和运动之运动中的共同困境，

即同样都是“除了自身劳动力外没有任何财产”，以及依旧都是那些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人的奴隶（Marx 1966: 3）。然而，相反的情况也必须适用。商学院的兴起，不亚于运动之运动的兴起；这意味着一个不易察觉的，但却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转变。而马克思的批判中的第一段也同样存在这样这样一种转变。事实上，因为拉萨尔写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之源”，马克思只反驳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之源”。文化不是作为劳动产品，而是作为一种物质条件，在这里被弃用以及仅仅在段尾才被引入。在之后的一句话中，马克思写道：“那些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们，在任何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必将成为其他那些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人的奴隶”（Marx 1933: 3）。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将社会和文化理解为单纯的产品，其成果将会被以拉萨尔等人所认为的更加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而是如他在《经济学手稿》（Marx 1973）中提及的一种“普遍智慧”（general intellect），这是一种生产力。在手稿中他的一个预言容许劳动站到生产一边，并且实际上他还补充了一句劳动可以站到两边，尽管这一点这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商学院学生和运动之运动的活跃分子可以认识到他/她的劳动力，可能是因为，生产的物质基础的倾向性转变，以及，有机会选择站在生产一边甚至站在任意一边，并有感知到他者代表的可能性和向他者表示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不满意用政策或政治经济学来进行批判，而是宣称他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纲领”（a socialist programme）去理解他的时代中这种趋势背后的深意。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停留在马克思的批判第一段上，它值得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网络（Networks）

马克思继续直接挑战拉萨尔纲领的出发点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最开始马克思似乎是违背了他的直觉，与财富相反，文化和劳动也许是在等式的同一边。他对普遍智慧的深入思考，

以及对劳动和生产条件之间的既不完全内在，也不完全外在的冲突的深入思考，似乎已经被收回了。他写道：“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并由此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来源，工人群体中的贫穷和受轻视状况就会不断加剧，在非工人群体中的财富和文化也会不断发展”(Marx 1966: 5)。这个声明不仅似乎回溯到非物质劳动，还与当代文化研究的感觉截然相反。然而我们不应该如此草率地理解它。

起初，马克思用上面这个句子替换哥达纲领后几行句子，随后他继续写道：“由于有用劳动（useful labour）只能在社会中且只能通过社会才能实现，劳动所得应平等地属于社会全体成员。”（Marx 1966: 4）。马克思发现这个声明将社会的维持放在了社会逻辑的中心。他控诉道“那些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拥护者总是利用这个主张”(Marx 1966: 4)。社会阶层和多样的私有财产促使他们索要他们自己的再生产首要权来维持和维护社会。但是在这个批判背后存在一个更加普遍的警示。社会劳动包含两个对立的社会层面：一方面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另一方面是生产者的社会。据列宁和葛兰西从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生活经历中推测，将生产条件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将会使得福特主义（fordism）及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社会性运用于生产者的社会。解放网络成为开放资源程序开发员和南半球非政府组织（Global South NGO）的共同目标。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里被简化为所有权和控制的问题。同样的运动将不会再关注于“占领国家”，而是满足于接管生产条件去维持和真正地推动社会发展。我们需要的，我们听到的，是更多的网络，正如曾经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厂一样。

那些真正迷失的是社会自身的生产，不是通过社会劳动而进行的社会维护。正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 2002）所说，社会劳动的能力不仅仅在于它可以构成一条流水作业线或一个网络社群，而是在于其他别的劳动“也许想要一起”通过社会主义纲领来思考这些形式。马克思最后一点不仅结合到了更加广阔的非物质劳动，结合了更加可靠的文化研究。我们需

要从相反的方面来思考为他人创造财富和文化的经验,或者说真正地不是为了他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基于对人们以前的限制规则的批判,也正是马克思思想通过社会主义纲领所表达的意思,人们所追求的不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肖像和代理人的崩塌和分隔,而是对于所有这些的一个解释。

分配政治学 (Distributive Politics)

接下来,马克思在他的第三点中阐述了他对分配的批判,可能比起他的年代,这个批判对现在来说更加重要。这个批判促使生产条件的政治学和我们称作生产条件的条件的政治学之间区别开来。在这个区别产生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展开了对平等(equality)这个术语如何从具有固定意义向具有纲领性意义滑动的讨论。但是我们将暂时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

马克思致力于反对这句“总劳动的合作规则是对劳动所得进行平等分配”(Marx 1966: 6)。但是他是真正地在对经典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指出,马克思已经了解了资本循环的两面性,但史密斯(Smith)和里卡多(Ricardo)并没有(Althusser 1970)。马克思注意到每一个循环都是它自身,并且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所同时产生的。因此,分配具有双重性,它产生了注定要被个体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分配。分配同时也意味着对财产、机器、工具、知识的分配,以及法律和规范的分配,而法律与规范也正是这种分配所引发的。这是分配的分配,或者说是生产条件的条件。马克思写道:“消费资料(means of consumption)的分配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一个结果”(Marx 1966: 10)。史密斯和卡里多忽视了对马克思所谓的消费资料分配有利的条件分配。现在依旧是任何分配政治学都太容易成为生产资料分配的唯一政治学,而不是成为为了分配而分配的政治学。对保障年收入、托宾税(the Tobin tax)、或低收入国家免除债务的呼吁再次涌上心头,这作为非社会主义的共同行动是合理的。

在批注的这个部分中，马克思想要为此类非社会主义共同行动提出建议：“劳动收益的公平分配”无法实现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它不承认社会主义已经出现，它不具有足够的纲领性去在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利之中，向解构主义进行借鉴。第二，他继续去质疑非社会主义共同行动的纯洁性，以及质疑一个纲领对参与共同行动有所帮助的原因。然而这样一个纲领则需要胜任这份工作。

拉萨尔的纲领号召工人们去恢复所有劳动收益的公平分配。但是这个公平分配的原则是具有欺骗性的。马克思质问：拿什么去代替生产条件，去扩大生产，去提供保险，去提供学校，医疗和失业救助，以及“管理的总成本不属于生产”。这些社会需求如何才能被保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绝不是以公平为依据计算出来的（1966: 7）。因此尽管这个拉萨尔式的纲领倾向于通过一个平衡模型来重建价值尺度（a general equivalent），这个简单的分配意图是不可能以公平的计算方式来实现的。这里需要一些更具纲领性的事物去把握工作中业已存在的东西，如用一个整体的项目来实现分配。这就要求如恩格斯所说的将整体还给整体（returning the whole to the whole）。

与其夺取生产条件，不如通过“公平分配”来保持价值尺度，而公平分配作为与社会总产品（social total product）的一个约定，它要面对的是在某些方面总会超出价值尺度的生产条件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价值尺度从不具有普遍性。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2000）认为：在印度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背景下，价值尺度总是在历史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并且，这种尺度总是取决于一种难以理解的、但却广泛存在的核心差异。

最初，这意味着劳动产品的，而不是劳动条件的分配需求，例如对保障年收入的需求，这有助于掩盖价值尺度的双重属性。事实上马克思发现对分配概念的简化不仅隐藏了分配的社会主义，也支持简化价值尺度。由于价值尺度的双重属性恰恰是自己的缺点，就像一种社

会恋物癖，它在不依靠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2004）所谓的例外状态是不能做对比的，然后号召这种恋物癖去传递分配公平，这并不仅仅是支持它的缺点中的等价物（equivalent），而是要呼吁这种例外状态的出现。

社会主义纲领至少提出了，劳动有着普遍智慧所具有的无边财富，它是可以做些什么的，而不只是平均分配而已，比如召集制定措施的主权暴力，及将生产条件的分配交给相似的政权来处理。相反，通过批判这样的主权和它的期待，劳动也许使价值尺度的双重属性受到了纲领野心的制约。非物质劳动应该在这里提供些什么。这样生产信息交流和情感的商品，受到价值尺度的影响时应该是不稳定的，借用一个旧词，这样的商品应该生产一个相当显著的形式上的矛盾，人们可以借用这样的矛盾去摆脱任何不承认自身所具有差异性的价值尺度。交换可能会在社会主义纲领下加剧，而不是将可用在拉萨尔式乌托邦中和在运动之运动的纲领中所有的交换都排除在外。人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分配的批判中读出社会主义交换，它促使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可以相互识别。另一方面，将交换从社会主义纲领中排除出去将会导致交换价值坍塌为的双方使用价值的代表，这就引发了一个人如何对其他人有用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关于这个困境的例子是他对“有用劳动”（useful labour）这个词组的嘲弄，他指出这个例子可能包括了一个孤独的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屠杀一只动物。（1966: 4）。

这里非物质劳动再次通过它具体的实例提供了开放性。非物质商品对其他人来说是交流和情感。但是在技术科学领域工作的女权主义学者已经指出，出于对利益和控制的目的，人们已经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通过将情感转换为信息交流以此将这类商品变得更加可测量。此处交流代表着交换价值，情感代表着使用价值。然而这些学者用情感扰乱了交流，用交流扰乱了情感。由于商品劳动更多地被非物质劳动所覆盖，帕特西亚·克劳夫（Patricia Clough）写道作为结果的主体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的战利品（Clough 2004: 13）。这些主体

间的任何价值交换必将引发一个可能被新存在的生产所超越的纲领。

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从他这句“价值的证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s of value）中注意到一些东西，他在他最有纲领性的作品中写道：

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受到谴责是因为它以价值尺度为特征，而价值尺度将所有其他价值形式扁平化，并让它们在它的霸权中异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如果不反对的话，至少在已有的生产基础上添加用于稳定物价的机构，这不能仅仅被抽象劳动时间或资本主义预期收益所决定。信息和通讯的革命是对新价值和新集体讨论的“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为最个体的，最奇特的，最具有分歧的事业提供机会。（Guattari 2000: 65）

因为分歧是一种开拓精神，而不是过度的攫取，交换必然会开启它内在的不公平，必然会背离价值尺度的资本主义纲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如果非物质生产条件是工人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这也将产生与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分配方式”（Marx 1966: 11）

平等（Equality）

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为何要避免把所谓分配的“主要的压力”（principal stress）放到一个纲领之中的原因。他察觉到只来源于分配单独一个方面并且不考虑生产条件分配的消费状况，可以帮助容纳过量的纯粹作为主体和公民的社会劳动主体。他再次指出在拉塞尔式的纲领中简单交换下产生的所谓分配压力是存在危险的。这些主体和公民现在看起来是理性的，是因为他们处于公平分配的纲领之中，生产资料被集体所有，再也没有原则与实践的冲突。但是他们始终是主体和公民，他们始终是“被一个相同的标准，即劳动，所生产出来的”（1966: 9）。他们始终以价值尺度和商品形态（这里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呈现的）为基础。正如弗莱德·莫

滕（Fred Moten）所说的，废除主体和公民依旧是一个亟待完成的事。因此我们在这里转向左派经常被提及的，但总令人不太满意的平等权利的问题。在马克思对作为分配的唯一方面的消费资料的批判，和他对社会主义中分配的第二方面和内在方面的关注中，平等权利作为一个固定术语已经逐渐被削弱。这里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在有不同能力的情况下去夺回他们所贡献的东西，那么那些他们夺回的东西将不是公平的。事实上没有任何平等权力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

究其本质，权力只可以存在于一个平等标准的实施中；但是不平等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将不是不同的个体。）只通过一个平等的标准来测量，目前看来，他们被置于平等的立场上，被从一个明确唯一的一方（definite side only）带来。例如，在这件事中，他们仅仅被视为工人，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出更多的东西，所有其他的都被忽视了。

（Marx 1966: 9）

这经常被视为马克思的后结构主义时期，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说的，此时的他滥用了平等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梦想。这个后结构主义纲领有效地连接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纲领和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这是她在“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产生前，针对马克思批注的后结构主义看法。

她继续指出：“在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当所有集体财富之源都更加充裕，只有那时，资产阶级权利的狭窄视野才能被完全超越，社会将会把这个口号铭记在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Marx 1966: 10）。这句话从列宁起已经被详细地解释过了。列宁将它视为目的论，因为劳动中的愧疚感在不断的消失。其他人将其视为一种宽容原则和一份道德声明。从非物质劳动的视角看来，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理解它。事实上，甚至从商学院的视角出发，

可能会使我们关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在这句子中颠倒了必需品和自由。在商学院，人们必须努力工作去达到金钱自由和获得金钱自由可以买到的那些东西。人们从必需品转向自由。在非物质劳动中，人们努力工作，但文化和技术产业窃取了自由。人们想要反过来从非物质劳动中的自由开始，但相反的是，人们从必需品开始，并期望成功的自由。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关于硅谷的书中记录了软件工程师努力地从他们在“人性化的工作场所”中产生的创造冲动的自由开始。他们以受到必需品的控制而告终。

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均衡是必须被颠覆的，基于共同尺度达成一致意见的交易是可以达成的。反而他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必需品的剩余物则排其后。每一个按照马克思的才能应被解读出的概念，也就是在潜力的语境中被提出的、马克思在普遍智慧（General Intellect）中描述出来的，也都排其后。工作中一展所长是生活中的快乐之事，也会产生数不尽的新需求。在这样不平等的环境下社会需求越多越好。之后这些社会需求被用于不平等的下半场去支持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社会需求生产。我们不可能知道人们奉献了什么，而在自由之后产出了什么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也是被更多的社会需求所拿去创造更多的自由。远非道德要求或目的论，当社会化将自己从价值尺度和商品形态的永不停歇的比较和扁平化中解放出来时，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完成他的批判性注释前，马克思还批判拉萨尔等人狭义地使用了国家（state）这个词来，后者用该词来表示政府机构。现在，这种戏法依然存在于各个领域，如公共管理，社会政策和商业和管理研究等。在这个部分马克思写下了对非物质劳动的潜力的最终评价，或者说是一个思考：

甚至在民主共和国见证过了黄金时代的粗俗的民主，都毫不怀疑阶级斗争必须通过斗争的形式得出结论恰恰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国家形态，尽管在警察所允许的和逻辑

上不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民主主义已经高如山峰。(Marx 1966: 19)

认为当代民主的粗俗化是将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过量社会必需品简化成的唯一代表，并没有言过其实。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可以表现更多吗？

社会主义纲领 (A Socialist Programmatic)

每一个参与组织有序的左派的人都知道宗派主义的遗留问题，当然我们也可能察觉到，马克思的一些刻薄抨击预示了这种分派，。但是如果非物质劳动可以代表什么的话，那就是劳动和它的物质条件在一个纲领中被强行组合的方式。非物质劳动据说产生与社会生产的直接生产质量。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纲领如今进入到了工人的灵魂中，就像工人的灵魂沦落到工作场所之中一样确定。面对这个纲领，工人当然想要找到一个“完全远离”它的位置。如米歇尔·福柯指出的，在劳动和资本之间最主要的分歧和敌意“仅仅被愈演愈烈”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资本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侵犯一定会为福柯最初追溯生命权利（biopower）留下一笔久远的遗赠。尽管如此，那种在“运动中的运动”网络和自治主义的批判性倾向中的乐观，还是可能成为计划性地雇佣资本的新潜力。然而如果这种乐观主义没有归入社会主义中的话，那么任何对福柯理论的引用都在提醒着我们存在着生物的，科技的，科学的危险会危害到非物质劳动。

也许此处就会有人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所具有的潜在有用性。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提出了计划保障性年收入这一设想，并对马克思对分配的批判理解的非常透彻。据此他们打破了收入的社会等价物，并受到被马克思称为“悲惨的基础”（miserable base）的工资的影响下工作。但是因为分配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消费资料的分配需要一种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的联合原则。换句话说，消费资料的分配需要在网络中，

通过强化和扩张那些从其余每一个人那里的需求，来实现追求社会财富的自由。这种网络只有按照近似马克思的“通过结社达到革命联合”的方式发展，它才会逐渐深化。

作者简介

斯蒂芬诺·哈尼（Stefano Hanney），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曾任教于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任战略、文化与社会研究室主任，现执教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原文题为 Programming Immaterial Labour. 原刊载于 *Social Semiotics*, 2006, 16(1), 75-87.